

001170

中国共产党

北京市崇文区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

1966~1989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组织部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北京市崇文区档案局

中国共产党 北京市崇文区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

1966~1989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组织部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北京市崇文区档案局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北京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崇文区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侯山潜

副组长： 卢 全 商进明

成 员： 徐光华 朱庆云 宋演武 张英敏 冯藏淑 李文苏

顾 问： 李 瑛 梁志华 盛绳武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崇文区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编辑组

主 编： 商进明

副主编： 朱庆云 宋演武 张英敏 贝光生

成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付静仪 刘翠英 刘汉富 杨效坚

姚玉玲 梁金生 裴增库 臧宝三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崇文区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侯山潜

副组长： 卢 全 商进明

成 员： 徐光华 朱庆云 宋演武 张英敏 冯藏淑 李文苏

顾 问： 李 瑛 梁志华 盛绳武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崇文区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编辑组

主 编： 商进明

副主编： 朱庆云 宋演武 张英敏 贝光生

成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付静仪 刘翠英 刘汉富 杨效坚

姚玉玲 梁金生 裴增库 臧宝三

目 录

领导人活动照片	(1)
---------------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崇文区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

一九六六年	(1)
一九六七年	(13)
一九六八年	(21)
一九六九年	(31)
一九七〇年	(39)
一九七一年	(49)
一九七二年	(57)
一九七三年	(67)
一九七四年	(79)
一九七五年	(87)
一九七六年	(97)
一九七七年	(105)
一九七八年	(115)
一九七九年	(127)
一九八〇年	(143)
一九八一年	(163)
一九八二年	(183)
一九八三年	(201)
一九八四年	(223)
一九八五年	(243)
一九八六年	(261)
一九八七年	(283)
一九八八年	(301)
一九八九年	(319)
附件	(337)
崇文发展照片	(351)

**中国共产党
北京市崇文区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六年

五月

中旬

崇文区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的发表和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形成的批判运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报纸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这篇文章,这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的不满,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966年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的宗旨是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局限在学术讨论范围内。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后,江青受林彪委托于2月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写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发至全党。《纪要》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污蔑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在批判“黑线”运动中,林彪、江青等人又玩弄权术,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了“三家村反党集团”事件(因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合办《三家村札记》专栏,故称“三家村”)。自此,在全市全国逐步形成了一场广泛的政治批判运动。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不但撤销了《二月提纲》和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而且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中央和中央机

关、各省、市、自治区也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领导权夺回来。《通知》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根据五·一六《通知》并随着全市全国形势的发展,崇文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很不理解的情况下也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并很快成为重灾区。

16日

区委召开常委会,第一书记吕连英传达市委关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同时讨论、安排全区工作。

17日

区委召开各基层党委、总支、支部书记会议,传达贯彻市委关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对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

21日

据区人委对城市公社工业的情况统计,全区公社工业从1958年建立以来生产规模有了较大发展。到1965年,全区公社工业共有77个工厂和142个生产组,社员14000多人(其中工厂有9000余人,生产组有5000余人)。八年共完成工业总产值14760万元,其中1965年完成2464万元,为1958年的3.03倍。产品品种共309种,其中119种纳入了市和国家计划。

六 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次日,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

字报。《社论》和《大字报》在全区引起强烈反响,并使崇文区大批判的矛头很快指向区委、区政府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3日

上午,区委在崇文公安分局礼堂召开各基层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和17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书记处书记李瑛传达了新市委领导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区委第一书记吕连英传达了新市委书记马力在2日夜间召开的座谈会精神。

4日

区委第一书记吕连英向基层党委、总支、支部书记传达了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的“中央8条指示”(“中央8条指示”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各高等院校、各中学派驻工作组时做出的),主要内容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斗争会只能在学校内部开;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等。7月18日,毛泽东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此“中央8条指示”被认为是“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吕连英等区委领导因传达贯彻“中央8条指示”,而犯了“压制群众革命”的路线、方向性“错误”。不久,即在造反派“冲破条条框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受到了无数大字报的围攻及轮番的批判斗争。

6日

中、小学校造反派开始冲击校领导及教师并开始出现打人现象。在被批斗的校领导及教师中,有的遭到打骂,有的身上被贴上大字报,受到种种人身侮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跑到区委,要求给予保护。

7日

凌晨,天坛派出所一些民警在区委西楼二楼楼道贴出了第一张点名批判区委第一书记吕连英的大字报。自此,不少基层单位陆续来到区委张贴大字报;区委机关内部也开始揭发市委、区委的“问题”。

12日

新市委派遣的工作组进驻崇文区。来自河北省的工作组近30人,今日进驻崇文区委,组长赵杰;来自北京军区空军的工作组4人,22日进驻崇文区委,组长张志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领导崇文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组由于被指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于8月18日晚悄然撤离到友谊宾馆集训。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工作组负责人先后被群众揪回,受到质询和批判。

23日

新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刘少奇副主席针对造反派轰赶工作组的情况所作的指示,要求“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区委第一书记吕连英、书记处书记、副区长李越参加了会议。会后,区委根据会议要求在全区开展了“反干扰”活动。数天后,参加“反干扰”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党团员就被造反派分别扣上了“镇压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保皇派”的帽子,遭到批判与围攻。

七月

上旬

工作组在区委南楼会议室召开机关干部会议,对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点名并丑化。自此,副部长以上干部大多“靠边站”,写交待材料,令其“劳动改造”。

8日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全区各行各业的工作秩序，基本情况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工作已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街道工作难以开展；教育教学秩序混乱，中学已不能正常开课；卫生防病工作难以开展，发病率普遍增加；财贸系统的商品零售额普遍下降，据百货公司、副食公司统计，6月份比5月份分别下降11.4%和8.4%，且服务质量下降；房屋修缮工作进展缓慢，对5031间危险私房在雨季到来之前只修好了5%，企业自管公房中的危险房屋情况严重，有的已直接影响企业生产及经营活动。

针对以上情况，区人委会同工作组研究了措施，进行了部署。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区人委的工作部署不但被冲垮，就连各行各业最基本的规章制度也被视为“管、卡、压”而遭到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进一步泛滥，使全区各项工作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

11日

新市委派丁平、肖德琳、李树屏、郭树桐等人到崇文区（公开身份称新市委派到崇文区的工作组）主持区委、区人委日常工作。

下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逐步成为造反派揭发、批判、攻击的主要目标，“火烧”的重点对象是：区委第一书记吕连英，书记处书记李瑛、陈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梁志华等区委领导，并把已经调离的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汝昆揪回来进行批斗。揭发、批判他们的大字报贴满了区委、区人委机关、各级党政机关和一些文、教、卫、体及企业的院落。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并勒令他们交代贯彻执行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和“罪行”，指责他们传达贯彻“中央8条指示”是“压制群众革命”。在批判斗争过程中，不许他们回家，不许他们出机关大门，强迫他们打扫卫生，接受“劳动改造”。

在“批倒批臭”区委主要领导的同时，造反派还令大多数区委中层领导干部“靠边站”，写交待材料，有的人还挨了打。

八 月

1 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转抄并视为造反大方向。

造反派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指引”下，更无顾忌地“炮打”区委领导，他们给区委领导扣上“走资派”、“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政治帽子，加以无情的批判斗争。后来，区人委主要领导和许多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也被戴上类似的帽子，党政机关的一些骨干和党团员也被冠以“黑干将”、“黑爪牙”、“黑苗子”、“忠实走狗”等“罪名”，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或批判。

18 日

新市委决定改组崇文区委，任免情况如下：

撤销吕连英区委第一书记，李瑛、陈山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丁平任区委书记；肖德琳、李越任副书记；李树屏任区委委员、组织部长；郭树桐任区委委员、宣传部长；吴本立任区委委员、区武装部第二政委；赵杰任区委委员、街工委代理书记。

以上 7 人组成新的中共崇文区临时区委。

19 日

区委改组后，随着全国批判运动的深入发展，造反派对以吕连英为首的原区委的揭发批判也达到了高潮，打倒“吕、李、陈、梁”的大字报贴满了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打倒吕家王朝”的标语口号。此后，原区委、区人委的主要领导以及中层主要领导被非法关进“牛棚”，实行群众专政。造反派不但扣发他们的工资，强迫他们进行劳动改造，还对他们进行轮

番的批斗或令其陪斗。批斗时,强制他们弯腰、低头、坐喷气式、挂黑牌子、剃阴阳头,甚至遭到污辱、谩骂、拳打脚踢等人身迫害。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他们的家被抄,他们的住房被抢占,家属子女惨遭株连。

中下旬

毛泽东主席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复信,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支持。18日,他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百万红卫兵队伍。林彪在检阅红卫兵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会后的第二天,崇文区红卫兵就陆续走向社会,开始“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破除他们认定的一切属于“封、资、修”的事物。破“四旧”运动从改名(厂名、街道名、学校名……)、剪长头发、烧戏装道具、毁坏文物开始,直至发展到没收一切“牛鬼蛇神”的财产、房产并勒令他们滚出北京;任何群众组织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名义揪斗、抓捕他们认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臭老九(对知识分子的污称)”,甚至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归国侨胞、原工商业者、有港台关系的人也遭到批斗、抄家、殴打及人身迫害。自此,全区陷入恐怖、动乱之中。

在破“四旧”运动中,仅本月下旬就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主要是:

24日傍晚,有人在延庆街25号蒋刘氏家后院小夹道内发现一捆伪钞。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红卫兵得知此事并听说蒋刘氏家是资本家之后,即对蒋刘氏家进行了抄家、用铁链、铁钩、桌椅腿等毒打蒋家7人。在持续近6天的批斗、毒打中,蒋家7人相继死亡。

是日,第26中学发生了“武斗、减薪”事件。在这场严重迫害知识分子事件中,有46名“劳改队员”(学校领导和教师)挨了打,

其中 20 多人被当场打伤,40 多人被减了薪。校长高万春在不堪忍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于 28 日跳楼自杀身亡。

25 日,发生了“反动资本家”李文波迫害红卫兵事件。李文波因对抄家、批斗、殴打不满,手持菜刀砍伤红卫兵和街道居民 7 人。事后,李跳楼自杀。原女十五中(现广渠门中学)一女学生被砍伤后,该校红卫兵毫无根据地认为校党支部书记梁光琪是迫害红卫兵的“后台”。在“讨还血债”的口号下,梁光琪被毒打致死。

27 日,第 11 中学发生“烧书、烤人”事件。该校红卫兵以学校用“封、资、修”书刊毒害学生为名,将学校 4000 余册书刊搬至操场焚烧,同时强迫校领导及骨干教师 13 人围在火堆四周接受“教育”。由于大火的燎烤,每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起了燎泡。事后,图书管理员沈时敏又被驱赶着搬运沥青,造成沥青中毒。在十分痛苦的情况下,她上吊身亡。

据统计,在破“四旧”(主要在 8、9 月份)的狂潮中,全区共抄家 9900 余户,抄收现金、银行存款合计 390 余万元,黄金 40 余万克,银元 27.3 万余枚,杂银 130 万克,没收 15000 户的私房 85674 间。期间,还抄收了大量的文物、字画、玉器、家具、衣物等;勒令 4200 多户近万名“牛鬼蛇神”回原籍。经核实,全区在“文革”期间被直接打死或自杀身亡者为 388 人。

对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行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大都敢怒不敢言;有些人偷偷给受害者通风报信,帮助收藏财物、送食品、记下害人者的罪行或“明批暗保”;不少人以坚持生产、加强值班、保护国家档案和财产等行动进行抵制和抗议。

本月

中共北京卫戍区委员会决定:丁平兼任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

本月

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贴出了一幅“血统论”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种谬论,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吹和支持下,也在崇文区传播开来,并很快成为打人的“棍子”。父母蒙冤,其子女也被诬陷为“黑帮子女”、“狗崽子”,遭到社会与单位的侮辱和歧视。

九 月

12日

区委、区人委召开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5日《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精神,并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崇文区接待站,任务是负责外地革命师生来京的接待工作。肖德琳兼任站长,张铨任副站长。接待站成立后,陆续接待了大量外地师生。从本月中旬到11月16日,本区的师生和一些单位的人员,也免费乘车去全国各地串联。串联浪费了大量国家资财,仅崇文区接待费一项就支出432.7万元。

14日

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着重研究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并就各单位建立抓“文化大革命”和抓面上工作的两套班子问题做了安排。

本月

为了把崇文区的揭发批判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区委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有3万余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吕、李、陈、梁”大会,并强迫他们绕场一周示众。

十 月

26日

市委派军队干部刘懋、宣杰主持区人委的工作。当日,他们召开区人委科长以上干部会,与大家见面并听取工作汇报。

十一月

上旬

10月,中央工作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并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又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宣称“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崇文区各造反派组织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也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全区各级抓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支持过工作组、保护过领导干部的所谓保皇派,不但受到批判、作自我检查,还必须向毛主席“请罪”,向群众道歉。

本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林彪、江青一伙就以歌颂“领袖”为名,大搞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为篡党夺权来捞取政治资本。在他们的煽动下,崇文区也掀起了“红海洋”的浪潮。全区无论大街小巷、单位院落、店铺门面都将大小不等的墙壁一片一片地涂上红漆,再用黄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或标语、口号。校园里、广场上、马路边、楼顶,以至厕所门口等许多地方竖起了一个又一个高大的红底黄字的语录牌、语录匾,全区如同一片红色的“语录”海洋。

19日

区委在崇文公安分局礼堂召开区级机关、各公社、各派出所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市委重要通告。“通告”指出:任何厂矿、机关、学校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28 日

区委研究了崇文公安分局成立临时党组的问题及其它事项。经研究,同意公安分局临时党组由 6 人组成,陈定(军队干部)为书记。

十 二 月

13 日

区委召开会议,传达市委工交会议精神和解决被轰走又返京人员吃饭、住房问题的要求;根据市委指示,着重研究了本区解决被轰走人员又返回北京的吃饭、住房问题。

24 日

区委书记丁平主持召开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市委关于搬迁工作的部署,决定成立区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军队干部宣杰任组长。任务是:根据市委有关指示精神,动员遣返农村又返京人员再回到农村去。

27 日

崇文区清洁队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传祥被江青诬陷为“工贼”之后遭到了区内外一些群众组织连续不断的批斗,并被挂上“工贼”、“粪霸”的黑牌子游街示众,被本单位造反派实行了“群众专政”。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专政队”对时传祥进行了连续三个月的刑讯、逼供和严重的人身迫害,其家属子女也遭到株连。期间,有人因对批斗时传祥不满而遭到迫害并陪斗上百次。1971年10月,时传祥因受到严重的人身迫害致病,并被“专政队”押回原籍山东,继续接受“劳动改造”。1973年8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时传祥被接回北京治病。1975年5月19日,因医治无效含冤去世,终年60岁。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6月30日,区委、市总工会、市环卫局在中